

目 录

“文化马赛克”与“中国大花园”

——《多元文化与西北民族教育研究丛书》主编寄语 张学强 (员)

前 言 (员)

第一章 明代的民族多元文化教育 (员)

摇一、明代少数民族的分布及社会发展状况 (员)

摇二、明代的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政策 (愿)

摇三、明代少数民族中的儒学教育 (员圆)

摇四、明代民族地区的小学与书院 (圆愿)

摇五、明代民族地区的医学与阴阳学 (猿圆)

摇六、明代基于各民族传统文化之上的学校教育 (猿圆)

摇七、明代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教育 (猿圆)

摇 结 语 (源圆)

第二章 明代的宗教多元文化教育 (源圆)

摇一、明代佛教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 (源圆)

摇二、伊斯兰教的发展、传播及其文化教育价值 (缘圆)

摇三、道教在明代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社会文化教育的影响 (缘圆)

摇四、明代的反宗教运动及其文化教育意义 (远圆)

第三章 明代中外文化交流及其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	(188)
摇一、明代对外政策及其与周边各国的文化教育交流	(188)
摇二、郑和下西洋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及其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	(189)
摇三、明末“西学东渐”及其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	(190)
第四章 明代的学术流派及其对文化教育多元化的影响	(193)
摇一、理学的衰微与王学的兴起	(193)
摇二、王艮之“百姓日用之学”的传播	(194)
摇三、明代东林学派的特质文化与教育使命	(194)
第五章 清代的民族多元文化教育	(196)
摇一、清代少数民族的分布及社会发展状况	(196)
摇二、清代的民族教育政策	(197)
摇三、清代少数民族中的儒学教育	(198)
摇四、清代民族地区的小学与书院	(199)
摇五、清代满族的学校教育	(199)
摇六、清代基于各民族传统文化之上的学校教育	(200)
摇七、清代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教育	(200)
摇八、晚清教育改革时期的民族教育	(200)
摇结摇语	(200)
第六章 清代的宗教多元文化教育	(202)
摇一、国家宗教祭祀与民间祖先崇拜	(202)
摇二、佛教的发展与转衰	(203)
摇三、道教的衰微	(203)
摇四、民间宗教的勃兴	(204)
摇五、伊斯兰教的演进与苦难	(204)

目 录

第七章 清代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多元文化教育	(四四)
一、清代西学东渐的历史流程	(四四)
二、清代“西学东渐”对近代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	(四四)
第八章 清代的学术文化派别与多元文化教育	(四四)
一、清代学术思想文化派别的历史嬗变	(四四)
二、浙东学派及其教育活动	(四四)
三、颜李学派及其教育活动	(四四)
四、考据学派及其教育活动	(四四)
第九章 承续中的突破：明清男权社会中的女子教育	(四四)
一、明代的女子教育 (四四—四四 年)	(四四)
二、前清的女子教育 (四四—四四 年)	(四四)
三、后清的女子教育 (四四—四四 年)	(四四)
主要参考文献	(四四)

前摇言

历时近五个半世纪的明、清两个封建王朝是中国多元文化教育的成熟期，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学术与阶层甚至于不同国家的文化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大地上并存，明清时期民族文化教育的多元化、宗教文化教育的多元化、学术文化教育的多元化及西方宗教与科学技术的传入构成了明清中国多元文化教育丰富多彩的画卷。

明代是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一些民族如回、裕固、土、撒拉、东乡、保安等民族最终形成，与此同时，东南、华南、西南壮侗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诸民族在其族体及分布上趋于稳定，为近现代民族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中国最后一个以少数民族为统治主体的封建王朝——清朝，促进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版图及民族格局的最终定型。在明、清多民族统一的封建王朝中，一方面，中央政府在民族地区推行“儒化”政策，比较积极地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学校教育及推行科举考试，对于形成中华民族一体观念及提高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各民族通过各种教育形式如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延续并创造着本民族灿烂的文化，这些都使得明清时期中国大地上的文化教育始终保持多元一体的格局。

明清时期的宗教教育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佛教除了继续在国家的统治及民众的社会生活中发挥重大的影响外，明初产生的藏传佛教在明清时期得到迅速发展并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藏传佛教教育体系；伊斯兰教宗教教育也有着很大的发展变化，明清时期的伊斯兰经堂教育、汉文译著运动及苏菲门宦的产生将中国伊斯兰宗教教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明清时期又是中西文化发生猛烈碰撞的时代，伴随着西学东渐，西方传教士将基督教带到了中国，尽管过程曲折、冲突不断，但基督教连同传教士一同带到东方的西方科学技术还是对中国社会的文化教

育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明清时期又是中国学术文化繁荣时期，明代王守仁及其弟子王艮等人的讲学活动及东林书院的讲学之风大大提升了学派的社会影响力，而清代的学派讲学之风也有着相当积极的社会影响，为明清社会文化教育的多元并存增添了新的内容。

明清时期的女子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宋、元以来的传统，但伴随着明清时期社会的巨变，在女子教育思想与实践上都出现了可喜的变化，封建社会中男性垄断教育的局面开始被打破，女子教育平等与自由的现象已初现端倪。

本书为集体撰写，前言、第一章由张学强撰写，第二章、第四章由郭军撰写，第三章由祁晓庆撰写，第五章由高丽萍撰写，第六章由张希亮撰写，第七章由杨慷慨撰写，第八章由王等等撰写，第九章由王娟撰写，全书由张学强统稿。

圆 缘年 苑月于西北师大

“文化马赛克”与“中国大花园”

——《多元文化与西北民族教育研究丛书》主编寄语

摇摇少数民族的文化与教育问题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十分关注的问题。事实上由一个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的神话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少数民族的文化与教育问题已经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东西方国家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多元文化与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领域也缺乏相应的对话。在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的学者话语与研究中缺失了对东方传统多元文化教育的研究与吸纳，东方国家的研究者又以西方多元文化教育乃西方移民社会的产物为借口而不积极关注。中国古人所讲的“他山之石”也就“难以攻玉”了。

多元文化教育是在西方多民族国家为在多民族的、多种文化并存的国家社会背景下，允许和保障各民族文化共同平等发展，以丰富整个国家文化的教育。19世纪以来，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经历了两次“进步”。第一次是19世纪中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是多元文化主义理念的萌芽时期，它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中心论解体的基础之上的。在此期间，英国和法国在世界上获得大片殖民地，对殖民地的研究成为殖民地行政的必需品。同时大片殖民地的获得为人类学研究西方民族以外的其他民族提供了调查和搜集材料的机会，因此在巴黎、牛津等大学出现了异族人类学研究的“黄金时代”，许多资料直接来自殖民地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考古学家。正是西方所谓贵族式的人类学研究使西方学术界开始关注多民族共存的世界。第二次进步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由于世界格局的再一次剧变，许多殖民地纷纷获得了解放，西方的霸权从英、法手中转到

员

了新兴的美国手中。旧的霸主（英国和法国）自然还力图保持他们的传统地位，研究异民族的“东方学”在他们手中仍然被视为“国宝”。不过，新兴的霸主美国进行大量战略性区域研究的同时，将异民族研究扩大到整个太平洋圈和亚洲的所有地区，这些研究大都以“跨文化理解”为口号。这样西方世界里就逐渐形成了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在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新西兰等，基本上都倡导多元文化教育，有的国家还颁布了多元文化教育法。统观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的背景，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二战以后的世界性移民风潮，在多元文化教育的政策方面，也有一个共享的术语，即“文化马赛克”，这是一个从种族中心主义的民族大熔炉中不断抗争而形成的概念，比喻单一的民族如同单一的瓷砖并不美观，而只有五光十色的“马赛克”共同在一起才能妆扮美丽与繁荣的建筑，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宏伟而需要马赛克点缀的建筑，民族就是五光十色的“马赛克”。

在中国讲到多民族、多元文化教育时，人们常常会引用费孝通先生的“中国大花园”理论，即中国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大花园中，百花齐放，百家争艳，相得益彰。强调的是文化与民族的平等与团结，正像一首歌中所唱的“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中国的多元文化教育与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与发展过程。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本身就体现着这种多元与一体教育辩证统一关系。从远古中华民族的文明多元起源和传说到奴隶社会的理想与现实，经整个封建主义社会再到近现代社会，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教育体系，除此之外还有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朝代的国家一体教育。一体教育是在多元共存的现实演变中逐渐形成的，多元教育是在国家一体教育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教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现实表现有着无与伦比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正因为这样才有钱穆先生的“民族形成文化，文化融凝民族，此中华民族之独有之道也”的结论。中国各民族的文化教育都是多元中的一元，这样就有缘个民族文化之“元”，这缘“元”又有一个凝聚的核心，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上民族大融合、大发展时期；时而是国家一体教育成为主流，这往往是历史的国家大一统、民族大团结时期。当多元教育占主流时，它处在显在的迅速发展时期，而国家的一体教育又处在潜在的发展时期，显在的多元文化教育为另一个显在的一体教育创造着条件。当一体教育占主流时，多元文化教育就处在潜在的发展时期，另一个多元文化教育为主流的朝代也就在孕育中。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中华民族的发展进入“自觉”的发展阶段，各民族在多元一体关系的维护上更加注重对国家一统文化的认同，尤其是在抵抗外国侵略方面更加显示了这种历史融凝而成的一体性。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为指导，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在民族区域自治中发展多元文化教育，在发展现代学校教育中促使国家一体教育的完善，从而使民族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并行发展，构建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教育体系。

多元文化教育始为西方国家民族教育的一种理念，但它一经形成，便成为一种世界民族教育的发展趋势。尽管中国与西方在民族教育的发展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并长期彼此漠视对方，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与进步，二者却在民族教育发展 with 多元文化的共存上“殊途同归”，犹如“计划”与“市场”不再是姓“资”还是姓“社”的划分依据一样，多元文化教育已不再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戒备”概念，而是世界民族教育发展的一种有效理念。东西方民族教育的发展正在形成共同的理念。西方国家多元文化教育发展模式主要有同化主义与多元主义共存的美国模式，以注重文化嵌合为主导的加拿大多元文化教育模式，在多民族社会中满足少数民族群体或个体在文化、意识、自我评价方面需要的英国多元文化教育模式，与偏见和歧视作斗争的多种族的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模式等。西方多元文化教育尽管与我国的民族教育还有些不同，但它的研究方法、理论成果、发展模式等许多方面都是比较成熟的，并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有较好的效果，对于我国的民族教育研究，有借鉴和吸收的价值。

多元文化教育发展已经出现了全球化的特点，如何以积极的态度借鉴和吸收西方多元文化教育中的优秀成果，是摆在中国民族教育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图 援我国民族教育对外应与国际多元文化教育接轨

多元文化教育的全球化及其在民族国家教育中的作用表明，少数民族教育不能独立于国家主体民族之外，而应是国家教育中多元一体的存在形式，同样，国家多元一体教育已不再是某一主权国家内的事，而是世界多元一体教育的不同存在形式。为此，我们要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东、西方民族教育对峙的局面，在多元文化教育的交流、对话中，使我国民族教育与国际民族教育接轨。在借鉴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的优秀成果中，扩大我国民族教育的内涵，民族教育已不再是少数民族教育的简称，而是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共同构成的国家多元一体教育。在此基础上，通过引进介绍、试点实验、创造特色等几个阶段的努力，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教育成为世界多元文化教育的一种典范。

图 援我国民族教育对内必须确立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

我国的民族教育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在发生的背景、实施的内容与方法、目标等方面均有很大的差异。可以说，我国民族教育的主要任务在于为民族地区培养各级各类现代人才。这是因为历史上少数民族遭受到本民族和汉族统治阶级的双重压迫，又多在环境险恶地带生存和发展，才使民族地区的现实要求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然而这一良好的愿望，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出一系列问题，主要是由于民族教育照搬内地模式而导致的结果。例如，体制上，没有总结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民族教育理论，虽然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有从民族小学到中学、民族师范及职业技术学校，甚至建有民族学院和民族高等院校，但是，完整而科学的民族教育体系一直没有形成。长期以来，民族教育作为普通教育的一个部分，忽视了其民族性；教学上，作为民族教育最有特色的民族教学理论尚属空白，科学的双语教学理论没有形成，各地的双语教学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课程设置上忽视民族传统文化建设，统一要求，与内地同科同目，开展“应试”与“升学”教育。这些不足之处又给人们以启发，我们的民族教育在强调科学教育的同时，轻视甚至忽视了人文教育，更为严重的是以汉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束缚民族教育的发展。归根结底是教育上缺乏多元文化的源

理念。对少数民族而言，决不能满足在法律上已经取得的平等地位和特殊待遇，要坚决地采取开放的态度，走出“博物馆里的活标本”误区，在经济上、文化上克服不平等现象，赶上先进水平。多元文化理念的确立才能真正体现我国社会的多元文化，才能使教育的发展既有国家的一体化又有民族的多元化，通过对汉族与少数民族同样的多元文化教育，统整国家层次的多元文化教育体系。

学校必须设置多元文化课程以实施多元文化教育

多元文化课程的实施，并不是要另设一门学科，也不是将所有少数民族的文化资产纳入现有的课程中，因为这将造成学校课程的壅塞，导致学生学业负担过重，而且也未必能真正使文化间有充分的交流或互动。多元文化教育的课程主要是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精华或特色融入学校现有的课程中，以反映文化多元的观点，并以全体学生（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学生）为对象，通过融入学校整体课程发展学生认知、技能、情意等方面的能力与态度。例如在文学课程、语言课程、历史和社会科学课程方面，可通过改革内容安排、改进教学方法等反映多元文化。藏族学校中开设的藏语文不应再是简单地翻译统编教材，而应增加藏族经典之作的內容以及现代藏族作家以藏文写作的反映藏族文化与生活的优秀作品。相应地在汉族学校的历史课中可增加少数民族历史习俗、文化传统的内容。多元文化课程还可以通过区域性或地方性的课程开设以及乡土课程的开设来完成。在我国的现行课程体系中，不论是国家课程计划，还是民族地区的一些课程计划，这方面的内容及形式都很不够，这正是多元文化教育留给我们的艰巨任务。

多元文化教育的“中国化”

世界各国在实施多元文化教育的过程中，做法不尽一致，这主要是“本土化”的结果。我国民族教育的发展源远流长，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同时，面对新的问题与挑战，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必须通过“中国化”、“本土化”来完成外来的多元文化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相互沟通、融合。多元文化教育的本土化有双层的涵义：一是多元文化教育在中国的生根、成长；二是多元文化教育在中国各少数民族中的“安家落户”并“反客为主”。在 20 世纪，谁率先完成多
缘

元文化教育的本土化进程，谁就率先完成了民族教育的现代化进程。西方多元文化教育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和复杂（种族、民族、性别、社会阶层等），而我国则集中在少数民族教育方面，本土化就是找准中国国情和民族特色的切入点，把公正、合理、科学的多元文化理念反映在民族教育的课程中。

基于此种观点，我们主编了《多元文化与西北民族教育研究丛书》。

万明钢摇王鉴

圆园零年 怨月 员日

第一章 明代民族多元文化教育

一、明代少数民族的分布及社会发展状况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组成中华民族的各兄弟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彼此唇齿相依、水乳交融，在相依中传承着各自的文化，在交融中不断催生着新的民族。尧舜禹至源流前中华各民族先民文化开始出现并逐渐孕育出华夏族的最初血脉，夏、商、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众多的古代民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东方九夷、南方苗蛮、西方氐羌、北方戎狄及东北肃慎等民族由于经济往来、文化交流及军事兼并等原因而与华夏族的关系日益紧密，而汉代已开始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立郡县，将众多的民族置于国家的统一管辖之下。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是一个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的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高句丽、柔然、敕勒、山越、僚等民族非常活跃，民族的融合与交流使多民族国家走向了新的统一。到了隋唐时期，青藏高原的吐蕃，南方的瑶僚、诸蛮，北方的靺鞨、突厥、回鹘、吐谷浑等民族开始进入阶级社会，民族的交融进一步加强。

自五代十国以后，出现了宋、辽、金、夏等各民族政权对峙时期，汉、契丹、党项、女真既有对立冲突，又有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而这一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再次改变了民族的分布格局，为元代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元代是中国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范围的统一政权，中央王朝第一次实现了对西藏地区的直接统辖，并在借鉴历代羁縻制度的基础上，在边疆地区尤其是南方诸民族地区创造性地实施土司制度，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

元灭明替，在明朝这一由中国主体民族汉族所建立和统治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存在的 160 余年中，一些民族如回、撒里维吾尔（裕固）、土、撒拉、东乡、保安等民族最终形成，与此同时，东南、华南、西南壮侗语族、苗瑶语

族、藏缅语族诸民族在其族体及分布上趋于稳定，为近现代民族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一）明代回族及西北地区诸民族的分布及社会发展

员援回族

回族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以伊斯兰教为纽带，经过数百年的融合而于元末明初形成的少数民族。早在唐宋时期，阿拉伯、波斯的穆斯林商人、使节先后来华，在长安、开封、广州、扬州、杭州等地居住，这些人的后裔与 员袁世纪初蒙古军西征时从中亚、西亚带来的大量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操突厥语的各族人经过长期的融合，并通过通婚与其他形式将一部分汉、维吾尔和蒙古人吸纳进来，最终于元末明初在中国境内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回回民族。

在明代，居于今新疆及其以西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由于战乱而大量移居中国内地，中亚、阿拉伯半岛诸国的商人绵绵不断的来到并定居中国，加之明朝推行的民族同化政策及伊斯兰教的传播使很多的其他民族人口融入到回族中，同时自宋元以来进入中国开封等地的犹太人，其后裔也大多融入回族之中，这些都使得明代的回族有了很大的发展。^①

明代回族分布于全国各地，主要集中在西北、云南及大运河两岸诸省，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局面。在西北地区，主要分布在明代陕西省的甘州、肃州、庆阳府（以上今属甘肃省）、西安府、延良府、凤翔府、汉中府（以上今属陕西省）、灵州、固原（以上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及哈密、柳城、吐鲁番（以上今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明代云南的回族有了迅猛的增长，成为我国回族的另一个重要聚居区，从杭州到通州的大运河两岸诸省及北京、南京等大城市也有不少回回居住，在江浙、福建、湖广、河南及海南等地也有大量回回散居。

回族在明代的政治与军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回族政治家和军事将领。明代回族主要从事农牧业、手工业及商业活动，有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在科学技术尤其是天文历算、医药学、建筑技术、兵器制造、地理学、史学及农业技术上有重要贡献，并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文学艺术，在文学创作、绘

^① 参见杨绍猷、莫俊卿：《明代民族史》，员袁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员袁页。

画、阿拉伯书法艺术、工艺美术、戏剧、曲艺及杂技艺术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维吾尔族

维吾尔族在明代史籍中被称为“畏兀儿”或“畏吾儿”等，主要分布于嘉峪关以西及天山以南的广阔地域内，主要聚居于哈密、吐鲁番、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北）、火州（哈喇和卓）、柳城（今鲁克沁）、于阗（今和田）、哈实哈儿（今喀什）等地。明代畏兀儿人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先后受东察合台汗国及叶尔羌汗国的统治，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兼营畜牧业，也有不少人从事工商业。

明代畏兀儿地区经济的发展及与周围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本民族文化发展。东察合台汗国时期，畏兀儿地区通行多种文字，如回鹘文、察合台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及古叙利亚文等，尤其是察合台文在明代发展到鼎盛时期，用此文字书写的文史哲、政法、医药、天文、地理方面的著作十分丰富，而到了叶尔羌汗国时期，畏兀儿族的文化艺术又有了重大发展，各种著作不断出现，音乐舞蹈盛况空前。

明代西北地区其他少数民族

除了分布全国、主要聚居于西北的回族和主要聚居于新疆的维吾尔族外，在明代，西北地区还分布着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如哈萨克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土族和裕固族等。

哈萨克族是由许多游牧部落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到元明时期已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明代的哈萨克族包括许多氏族与部落，主要分布在我国新疆西北部及中亚，每一个哈萨克部落的游牧地都分布很广，分属于不同的汗国并迁徙不定。明代哈萨克族的社会由两大阶级组成，统治阶级包括原有的速檀、比、巴图尔和其他氏族部落的头目，被统治阶级主要包括牧民、牧工和奴隶，其经济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也占有重要地位。明代哈萨克的文化处于一个转折时期，在宗教信仰上已普遍接受了伊斯兰教，并影响到其哲学思想、文字、教育、建筑艺术及生活习惯，但同时又保留着古老的传统文化，而随着哈萨克汗国的建立，以政治的统一、民族的聚合及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哈萨克的文化进入了一个比较繁荣的时期，在哲学、文学、艺术、历史、建筑、历法及法律等方面有突出的表现。

撒拉族自称“撒拉尔”，他们的先人是从中亚撒马尔罕一带迁来，而在元明

之际在中国逐渐形成民族共同体。明代撒拉族主要聚居于今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后来随着人口的发展，部分逐渐移居至相邻的化隆回族自治县和甘肃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明代撒拉族处于明王朝及土司的双重统治之下，主要从事农业、畜牧业，靠近山区的撒拉族也兼事狩猎和伐木，撒拉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字。

东乡族的主要来源是元明时期进入东乡地区的回回和蒙古人，并吸收了当地的部分汉族和藏族。明代东乡族居于河州（明属陕西，今属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地区，族称因居地东乡而得名。东乡族形成后，经济上农牧并重，也从事手工业生产。

明代保安族居于今青海同仁县隆务河两岸的保安、下庄、尕撒尔三地，俗称“保安三庄”。保安族的主要来源是元代一支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融合了居住于该地区的部分汉、回、藏、东乡、撒拉等族，形成信仰伊斯兰教并有自己语言的民族共同体保安族。保安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少量兼营畜牧业，工商业也有相应的发展。

土族也是在元明之际形成的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尽管史学界对其族源尚无定论，但与古代的吐谷浑人有重要关系。主要分布于河湟流域，即今互助、乐都、门源、民和、天祝及甘南、临夏、武威一带，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明代对土族的管理除了建立军政合一的卫所制度外，主要采用封受土司“以土治土”的方式管理。明代的土族经历了从畜牧业为主到以农业为主两个阶段，其手工业主要是农牧产品加工。

裕固族与维吾尔族有同源关系，是明代在我国甘青地区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其族源可追溯到唐时居住于色楞格勒河和鄂尔浑河流域的回鹘。明代裕固族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工商业不发达。明代裕固族已接受黄教，并于明末兴建了第一座黄教寺院古佛寺（黄番寺）。裕固族在形成过程中产生了裕固语，但未产生裕固文字，因此便以民间口头创作形式创作了本民族的神话、传说、寓言、民歌、叙事诗、格言和谚语等。

（二）明代南方诸民族的分布及社会发展

瑶壮族

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明代瑶族除了分布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源

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县、广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及邻近的贵州、湖南部分地区外，还曾分布于其他一些地区，如广东肇庆、高州、廉州、雷州半岛等地区。明王朝首先在广西壮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然后逐步推广到其他地区。明代壮族地区境内为农奴制度，但明中后期封建农奴制度开始瓦解，地主经济产生并有了一定的发展。明代壮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并有较为发达的手工业，商业则较为落后。明代壮族的文化生活，以普遍流行于民间的壮族民歌（俗称“答歌”）者最具特色，汉族文化、经典与诗文已传播至壮族地区，并对壮族上层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明代南方其他少数民族的分布及社会发展

除了壮族外，明代南方还存在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如侗、水、土家、瑶、仡佬、毛难、畲、黎、高山等族。

明代贵州黎平府为侗族的最大聚居区，除此之外，明代湖南靖州所属天柱、通道、绥宁等县和广西怀远县也是当时侗族的主要聚居区。明代侗族主要从事农林业、手工业，商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形成了许多商业贸易中心。明代侗族民间的文化艺术主要是口传文学，包括诗歌及传说故事等，而侗族的音乐、舞蹈也早已驰名全国。

水族的族源与壮侗语族诸民族一样，共同由百越民族群中的西瓯、骆越发展而来，明时居住在今贵州独山县及荔波县及三都水族自治县等地。明代水族地区社会分为受明王朝直接委派的流官统治的地区和受土司统治的地区，前者已发展到封建地主经济，后者仍停留在领主经济阶段。水族的生产以农耕稻作为主，有纺织、铁匠、木匠、石匠等手工业，民间文化艺术也很丰富。

土家族的族源有江西、乌蛮、巴人三种说法，明代土家族主要分布在今湘西、鄂西、川东及黔东北四省毗邻地带。明代土家族地区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封建领主制度，其社会生产，以农业为主，有较为发达的手工业，商业也有相应的发展。明代时土家族的民间文艺非常丰富，其上层社会已逐渐受到汉文化的熏陶。

瑶族最早分布于长沙、武陵郡一带，明代其分布中心已由湖南转至广东、广西。明代瑶区的经济以农业种植为主，采集、狩猎、畜牧业和家庭手工业也有一定地位，明代瑶族的口传文学非常丰富，民间中草药知识也很丰富。

除此之外，明时在广西、福建、浙江、海南等南方沿海平原、山区还居住着

缘

仡佬、毛难、畲、黎、高山等民族，主要从事农业及手工业等生产活动，有着各自的民间文学艺术。

（三）明代藏族及西南诸民族的分布及社会发展

藏民族

明代在藏族地区设有乌思藏都指挥使司和朵甘都指挥使司，下设若干行都指挥使司、万户府、千户府、百户府或宣慰使司、招讨使司等，前者辖今西藏大部分地区，后者辖今甘、青及四川甘孜、西藏昌都等地藏区。藏区从 13 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后，就开始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到 14 世纪初已确立封建领主制社会，进入明代时期后，领主农奴制继续发展。明代藏区主要经济形态为农牧业，手工业水平也很高，商业相当活跃，出现了许多商业中心城市，和汉民进行的茶马贸易，在明代有了新的发展。同时由于明代藏区政局相对稳定，生产和商业活动繁荣，藏区医学、文学、史学、藏历、建筑、绘画、雕刻、艺术、藏戏都有了显著的发展。

苗族

苗族是我国南方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民族。明代苗族已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主要聚居于黔东南、黔东北并散居于贵州其他各地，滇东北、滇东南、川南、桂北及海南岛也有苗族居住。明代苗族的社会经济形态主要为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和交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明代苗族上层汉文化教育有所发展，但民间文化如诗歌、故事、传说、谚语等主要为口传文艺。

白族

白族据传来源于汉代的僰人。明代云南大理府为白族最大的聚居区，楚雄府、姚安府、曲靖府及其所属州县也有不少白族居住，鹤庆军民府、剑川州、安庆州则为白族土官世袭领地。由于明王朝以军事方式平定白族农奴主叛乱，同时白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接近汉族地区，因此明王朝在白族主要聚居区设流官以治之，在边远山区的府州县和县以下，则仍然保留土司制度。由于明初白族主要聚居区废除了土司制度及领主农奴制，地区经济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农业、手工业、商业及采矿业较为发达。明代白族的科学文化在水利工程建设、天